

# 漢唐外交制度史

(增訂本)

History of Diplomatic System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黎虎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漢唐外交制度史

(增訂本)

History of Diplomatic System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黎虎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外交制度史 / 黎虎著. —增订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  
ISBN 978 - 7 - 5203 - 3037 - 4

I. ①汉… II. ①黎… III. ①外交—制度—史料—中国—汉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3605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  
插 页 2  
字 数 636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简介

汉唐时期中国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纵横捭阖于欧亚大陆暨海东、南海迤邐地中海沿岸诸国，开创了中国古典外交的辉煌时期。在此基础上创建并施行了一整套古典外交制度，支撑并推动了这一历史时期外交的发展。本书首论外交决策制度，揭示了皇权体制下的外交决策方式、方法、程序、体制；次论外交管理制度，揭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主管机构到关涉机构，从外交政务到外交事务，既分门别类缕述不同的机构、官员及其职能，又提要钩玄展现了诸机构的分工合作和外交运作的全过程及其一体性。本书所揭示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制度，奠定了日后诸皇朝外交制度之基本模式。

封面题签，前六字为（唐）褚遂良墨宝，末一字为（唐）欧阳通墨宝。

季羨林先生为本书题签和所写  
《推荐书》

---

汉唐外交制度史

季羨林题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Telex 22239 PKU CN  
Fax 86-1 255-4055  
Beijing 100871 China

### 推荐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黎虎教授, 博士生导师, 穷十数载之力, 写就了一部长达三十万字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一部十分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巨著。

中国位于东亚大陆, 五、六千年以来, 不可避免地要与同陆上的国家打交道。其向  
中外关系错综复杂, 疏结纷繁, 时盛时衰, 时起时落。中国不管哪一个朝代, 中央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 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有成功, 有失败, 有吸取, 有借鉴。因而政府  
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法, 如何决策, 如何建立  
相应的机构, 来贯彻已决定的政策。  
中国历史的特征, 就是朝代变换频繁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Telex 22239 PKU CN  
Fax 86-10-62054095  
Beijing 100871 China

后一个朝代，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建立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朝代更迭，经验积累。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

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时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陈虎教授堪称第一人。所以我认为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陈虎教授独具慧眼，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穷十年之力，在浩如烟海的群籍中爬罗剔抉，搜求资料，终于写成这一部书，一部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同僚和重雅推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 季羨林

1996.8.3

## 推荐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黎虎教授、博士生导师，穷十数年之力，写成了一部长达三十五万字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一部十分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巨著。

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五六千年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同周围的国家打交道。其间中外关系错综复杂，头绪纷繁，时盛时衰，时起时落。中国不管哪一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都必要认真对待，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有成功，有失败，有欢欣，有苦难。因而在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法。如何决策，如何建立相应的机构，来贯彻已决定的政策。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朝代变换频繁，后一个朝代，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建立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机构。朝代既多，经验斯丰，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

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黎虎教授独具慧眼，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穷十余年之力，在浩如烟海的群籍中爬罗剔抉，搜求资料，终于写成了这一部书，一部有开创意义的著作。用敢郑重推荐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

季羨林

1996. 8. 3

## 序 一

外交，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汉武帝便曾派张骞出使西域，对大月氏、乌孙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力图远交近攻，以夹击匈奴。事虽未成，却充分反映了古代统治者对外交的重视。至于后代，外交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如公元450年魏太武帝南伐，路经彭城，派尚书李孝伯进行外交活动，企图不战而下；刘宋安北长史张畅拒之，二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资治通鉴》记下此事，称“畅音容雅丽，孝伯与左右皆叹息；孝伯亦辩赡”。胡三省注：“兵交，使在其间。史言行人（指外交人员）善于辞令，亦足以增国威。”由于有外交活动，很早便建立外交制度。至迟汉代已设大鸿胪、客曹尚书掌其事。如客曹尚书职权便是“主外国夷狄事”；东汉分为南、北主客曹，更可见其管辖范围之广。可是长期以来，对外交制度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寡见所及，从无专著问世。一般政治制度史著作，也几乎没有看到有辟出专门篇章予以论述的，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可喜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黎虎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于繁重教学工作之余，撰写了这部几十万字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正好填补了这个学术空白。拜读初稿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这是一部史料丰富、考证严谨、具有开创性的优秀史学专著。

首先是开创性。如上所述，前人著作论述甚少，无可参考、依傍，本书不得不自创体系。机构方面，既考订专职机构，又根据具体史料，提出“关涉机构”进行论述；特别是并不就机构论机构，而是首论决策，强调决策权在外交中的巨大作用。这些以及全书崭新的体系都是开创性的集中体现。

其次是考证严谨。如论述外交决策大权集中于皇帝，举汉代陈汤、

甘延寿例便相当有说服力(二人在西域自行决策出兵,斩匈奴郅支单于首,虽为汉朝除去大患,立下大功,但因“矫制”,经过朝廷群臣长期争论,最后终受谴责、惩处)。再如突出魏晋南北朝尚书主客曹的外交职能,因为有关官志、《通典》记载过于粗略,作者便通过大量史料,排列出南北朝主客郎的名单,进而对其外交职能展开较清晰、多彩的介绍。其严谨考证举二例:举邢伟墓志证明北魏尚书主客郎可以是尚书南、北、左、右主客郎的省称;不同意《历代职官表》关于四夷馆属大鸿胪管辖的说法,引《魏书·萧宝夤传》以证四夷馆当属尚书主客郎具体管辖。这些都是有说服力的。再如将隋唐鸿胪寺的外交职能归纳为十六条,十分细致,全引史料为据。其中提出第三个职能为“拟授官位”。此权《唐六典》及两《唐书》官志记载不明确,本书引《全唐文》卷九九九吐火罗贵族仆罗上书指责鸿胪寺“授官不当”;又引《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唐玄宗对此事的批示“敕鸿胪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这一职能的存在便确定无疑了。

再次是史料丰富,注意吸取前人某些成果。如论述唐代后期“使职差遣制度的盛行”,参考陈仲安先生等专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观点;分析唐朝与边地羁縻府州的关系,根据谭其骧先生论文“唐代羁縻州述论”的看法。他如多处利用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朝鲜《三国史记》、阿拉伯《中国印度见闻录》,以及日本学者的《续日本纪》《日本书纪》等著作中有关史料。至于一般史书、类书、笔记、文集、诗集,以至敦煌吐鲁番文书、历代墓志等,旁征博引,相当广泛。

总之,黎虎教授这一专著乃开创之作,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优点突出,富有学术价值,某些内容或许还可供当前外交工作参考与借鉴。

专著即将付梓,在此谨为黎虎教授贺,并将拜读初稿后的体会,赘述几句如上,十分粗略,勉强算作一篇序文吧。

北京大学

祝总斌

1997年8月

## 序 二

对外关系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限于中外交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外政治军事关系等方面，而对于各个王朝的外交制度则均未触及。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乃是这个领域的开创之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研究的空白。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开创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也是中国外交制度从确立到完善的时期。汉唐时期的外交制度不仅对此后各王朝，而且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外交制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外交史，全面了解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分为决策和机构两大部分。决策方面按照时期从皇帝决策、宰相决策、百官决策几个层次进行论述。机构方面除了论述中央的专职管理机构和关涉机构，还详细论述了地方的管理机构，包括地方行政系统、军事与边防系统以及边镇镇抚系统。全书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材料丰富、考证细致入微，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全面、系统、准确的汉唐外交制度的画卷。

本书对于汉唐外交制度不是孤立、静止或笼统的叙述，而是严格从史实出发，按照制度本身的发展，清晰地勾画出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找出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作者不仅注意到各个时期之间的不同，而且注意到一个朝代中不同时间的变化。如在叙述唐代仗下后决策和延英决策时，都明确指出实行这些制度的时间。在论述唐代外交管理机构时，特别论述了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功力和学术上的追求。

《汉唐外交制度史》即将出版了。这样一部科学性高、系统性强，凝聚了黎虎教授多年心血的学术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满足各界人士对这一领域知识的需求，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

吴宗国

1997 年 8 月

## 前 言

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以和平方式进行交往、交涉的政治行为。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内政的延伸，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手段。

中国古代有“外交”一词，泛指与他人或他国之交往。而关于与他国交往，其含义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先秦两汉六朝时期，其与今天“外交”一词有所不同。鲁隐公元年（前 722）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记作“祭伯来”，而没有记作祭伯“来朝”。《春秋穀梁传》对此解释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sup>①</sup> 因为祭国是周天子畿内的诸侯，他没有得到“王命”而私自出访，所以不记作“来朝”而记作“来”，表示对其所进行的不合“礼”的对外活动的贬责。由此可见这里“外交”一词是指臣下私自对外交往，即所谓“境外之交”，含有“里通外国”、相互勾结的意思。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非礼的举动，所谓“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sup>②</sup>。这个含义一直沿袭下来，战国时苏秦曾抨击“夫为人臣者，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sup>③</sup>的行径。三国时孙吴张温出使蜀汉，曾向蜀人称赞同行副使殷礼，后孙权因内部矛盾将张温问罪，以此作为其罪行之一。将军骆统上表为

---

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366 页。

②（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五《郊特牲》，《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47 页。

③（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261 页。此句在《战国策》作：“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一四《楚一》，巴蜀书社 1987 年版，上册，第 498 页）

张温辩护,认为奉君命出使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sup>①</sup>。他们所使用的“外交”一词都还是这个意思。到了唐宋时期这个词虽然仍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含义,但已经多少有了现代汉语“外交”一词的含义了,息夫躬向汉哀帝设计离间匈奴与乌孙关系时引用了《孙子兵法》“其次伐交”一语,唐人颜师古对此解释道:“知敌有外交连结者,则间误之,令其解散也。”<sup>②</sup>这里的“外交”已有两国之间交往之意了。北宋神宗诏称“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欢”<sup>③</sup>,元丰七年(1084)李宪上奏宋神宗曰:“自古控驭戎夷,使其左枝右梧,为备不暇,盖由首先结其旁国,绝其外交,然后连横之势常在中国,彼有犄角之患。”<sup>④</sup>他们所使用的“外交”一词均与现代汉语“外交”一词相近了。故晚近以“外交”一词指称国家之间的外交并非偶然。

此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不少专门性词语以表示外交。在周代,“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sup>⑤</sup>。诸侯之间的“问”“聘”“朝”即为“邦交”,它们都有外交的意思。据称周代已有“掌交”一职,负责“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交好”。郑玄说,所谓“通事,谓朝觐聘问也”。贾公彦进一步解释道:“两国交通之事,惟有君臣朝觐聘问之事,结使交好,故以朝觐聘问解,则《易》云‘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也。’”<sup>⑥</sup>这里的“通事”“交通”“交好”“朝觐”“聘问”等也都有外交的含义。“外事”一词也含有外交的意思,《尚书·康诰》:“外事,汝陈

① 《三国志》卷五七《吴志·张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3页。

② 《汉书》卷四五《息夫躬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3页。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庆历二年〉》:“今调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陕西。若使二虏并寇,则难以力支。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则虏势减半,不能独举。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元昊地狭,贼兵不多,向来攻我,传闻北虏常有助兵。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而元昊骤然被击,必求助于北虏。北虏分兵助昊,则可牵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则二国有隙,自相疑贰。此亦伐交之策也。”〔(宋)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六《居士集·准诏言事上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1页〕这里的“伐交”指破坏辽与西夏通过外交而结成的军事同盟,与颜师古对“伐交”的解释是一致的。

③ 《王安石集》卷四七,又见《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八。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02页。

⑤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七《秋官司寇·大行人》,《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3页。

⑥ 《周礼注疏》卷三八《秋官司寇·掌交》及注疏,第903页。

时臬。”孔氏传云：“言外土诸侯奉王事，汝当布陈是法。”<sup>①</sup>总之，在古汉语中表示外交意义的词语还是比较丰富的。这无疑是当时社会现实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不仅在中国出现较晚，西方国家亦复如是，英语“外交”一词 *diplomacy* 的存在也不过两个世纪。现代英语“外交”一词，源于希腊语，其罗马字为 *diploma*，这是古代希腊公使出使时由君主所授予的折叠式证书。但是直到 18 世纪末年英语 *diplomacy* 才有今天的“外交”的含义<sup>②</sup>。这表明西方的外交是渊源于使者所持之证书。这同中国古代外交之起源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中国古代的使者在出使时也持有权力和身份的证明——节，故称“持节出使”，因而“使者”又被称为“使节”。虽然中国和西方在古代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但这并不表明古代中国或西方没有外交。

## 一 自古就有外交

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部落阶段，氏族部落之间一方面存在着相互的血族仇杀与械斗，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和平交往与交涉。当国家形成之后，这种原始的氏族部落间和平交往、交涉所累积的方式与惯例，遂衍变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之一的外交。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外交发展历史。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即前国家时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和平交往已经在文献记载中有了某些踪迹可寻，据说黄帝时“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sup>③</sup>。这是部落联盟间在战争之后进行的和平交往。因而职掌对外接待的“官员”也已约略可见，据称唐尧时曾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负责宾迎“四方诸侯来

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四《康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版，第 204 页。

② 参见〔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9 页。

③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 3 页。

朝者”<sup>①</sup>。这是远古时期首见之迎接四方宾客职务，而舜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见诸载籍之外事“官员”。据说舜时又曾以“龙主宾客，远人至”<sup>②</sup>。龙则是继舜之后见诸载籍的又一位外事礼宾“官员”。

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早期外交亦应运而生。殷商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史”（使）和“史人”（使人）的记载，这里就包含有商王朝与周边方国、部落交往之使节；至于“来王”“来献”“来朝”和“氏”（致）与“工”（贡）等卜辞，则表明周边方国、部落与商王朝之间存在着某种“朝贡”关系<sup>③</sup>。西周实行“封邦建国”制度，西周王朝与封国间的一套朝觐聘问制度，更为日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外交制度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各国在争霸战争的同时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据鲁史《春秋》所记的242年里，列国间的战争凡483次，朝聘盟会凡450次<sup>④</sup>。这里的朝聘、盟会即为外交活动。从而呈现出各种聘使、行人络绎不绝，仆仆于列国之间的繁忙景象。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升级，列国之间的外交斗争也更为激烈，“合纵”与“连横”为代表的两种外交方策略，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长期的、尖锐的交锋与较量，从而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艺术推进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不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外交，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也同样有着古老的外交历史。

1887—1888年发现的“推尔·阿玛尔纳文书”中保存着一些古埃及十八王朝时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爵写给埃及国王的外交文书，其主要内容“都是些互致敬仰和爱慕，关于通婚的谈判，和请求埃王赐予作战时的援助，赐予金子和礼物”。而第十九王朝的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人皇帝赫吐希尔三世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则是最早一部传世的国际条约，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实为后来各种国际条约的原型”<sup>⑤</sup>。

印度历史学家萨曼德拉·莱·罗伊在《古代印度外交》中说：“有充

① 《尚书正义》卷三《舜典》及《孔氏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

②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3页。

③ 参见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④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9页。

⑤ [苏联]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5—8页。